

“耻化”叙事与文化创伤的建构： 《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 (1949-2012) 的内容分析

李红涛 黄顺铭

内容提要 本文借助文化创伤理论，运用内容分析方法，研究了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如何纪念南京大屠杀、呈现相关的当代事件。研究发现，“纪念事件”和“否定言行及回应”构成了最重要的主题，也代表了两条基本的叙事线索。它们将南京大屠杀及其当代记忆困境建构为历史的和当下的文化创伤，而其核心主题都是“耻化”叙事。在这些叙事中，《人民日报》主要依赖加害者和见证人来“为历史作证”，并建构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受害者/幸存者的主体地位则被弱化，更多被视为仪式化的角色。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 耻化叙事 文化创伤 集体记忆

一、引言

在1997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The Rape of Nanking*)一书中，张纯如称这场发生于60年前的大屠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forgotten Holocaust)，^[1]一针见血地道出了南京大屠杀所遭遇的集体记忆困境。的确，无论是就大屠杀的史料发掘和公共讨论而言，还是从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和传播来讲，南京大屠杀都无法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

1937年12月至1938年初，在南京大屠杀发生之际，国内媒体就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多强调“英勇抵抗”和“鼓舞士气”；^[2]而国际人士的目击报告和国际媒体的报道则进一步令大屠杀的真相为世界所知。^[3]事实上，在“南京大屠杀”变成一个用以指称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暴行的专门术语的过程中，新闻媒体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4]然而，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南京大屠杀却几乎从报纸、影视以及抗战记述等公共话语之中销声匿迹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等现实社会政治议题和中日关系的波动，南京大屠杀才终于重返公共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成开放，纪念意

识才慢慢变得自觉而明晰起来。

既有的研究对于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所遭遇到的记忆和遗忘的曲折历程多有回顾，并试图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等多个层面来寻求解释。然而，集体记忆并不全然是社会政治外部环境的一种折射，它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再现和实践的过程。本研究试图从文化创伤理论出发，探讨新闻传媒在建构文化创伤和形塑集体记忆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鉴于《人民日报》是党、政府和人民的最权威的媒介话语平台，在攸关党、政府和人民最重要的利益的问题上往往扮演着“定调者”的角色，因此，我们以该报作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南京大屠杀纪念话语的系统分析，来展现大屠杀集体记忆在我国主流话语空间中的基本面貌，并追踪它的变迁轨迹。具体而言，我们对《人民日报》在1949-2012年期间刊登的341篇大屠杀纪念文章进行内容分析：通过呈现描述性的内容（例如，报道数量的年度分布、标签的运用、纪念情境与纪念场所），同时结合文本细读和不同维度（时间维度、主题维度）的比较，本文着重回答以下几个研究问题：（1）南京大屠杀是否以及如何被建构为文化创伤？（2）新闻媒体借助于哪些行动主体来建立其创伤叙事？加害者、受害者和见证人如何扮演集体记忆的承携者角色？（3）纪念文章中所浮现出的主导叙事是什么？它们是否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

二、文化创伤与集体记忆

南京大屠杀在战后相关各国的不同时期呈现出了不同的“记忆”景象。^[5]吉田隆（Takashi Yoshida）全面回顾了南京大屠杀在日本、中国和美国所引发的历史和记忆问题。^[6]他从区域政治和国际关系的视角出发，将大屠杀以来的历史划分为1937-1945年、1945-1971年、1971-1989年以及1989至今（后冷战时期）等四个阶段。在前两个阶段，南京大屠杀被中国官方当作众多战争暴行之一，其重要性局限于地方层面，对它的纪念和集体记忆的保存也尚未提上日程。在第三阶段，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经历了一个国家化的过程，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被不断地强调，并成为了象征日本侵华战争暴行最重要的符号。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爱国主义教育运动的全面开展，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和文本再现被融入了近代史的宏大叙事；而日本右翼修正主义者对于大屠杀的否认言行则从反面“刺激”各种大众媒介刊发了大量的纪念文本。

以往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和外交关系等层面来解释南京大屠杀在当代中国公共话语空间和集体记忆之中的沉浮起落。1949年之后的30年间，南京大屠杀在公共视野中基本上处于湮没无闻的状态。1951年和1960年，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控诉和报道曾短暂出现在《人民日报》和其他地方性媒体上，并成为全国范围内反对“美帝”武装日本的宣传和抗议活动的重心。刘燕军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记述和分析，揭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需要如何影响甚至“扭曲”了集体记忆的样貌。他指出，当时的宣传思路是从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开始，延伸到控诉美帝的罪恶，

引导民众认识到“美、蒋、日、特务是一家”，而由国际友好人士组织的难民区也被描绘成了“受难的难民区”。然而，控诉活动很快就销声匿迹，其根本原因在于，“南京大屠杀作为一段苦难、屈辱的历史，与高歌猛进的革命胜利不合拍，宣传得太多显然不合时宜”^[7]。此外，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则更多地将南京大屠杀与国民党消极抗战、屈辱投降联系在一起。最后，1960年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将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相区分的外交思路，以及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都抑制了对于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发掘和呈现。^[8]

沿着同样的思路，1980年代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新浮现也被放到了国内和区域/国际的框架下，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和中日关系的变动等角度加以解释。^[9]一位学者对南京大屠杀的图片呈现进行分析之后发现，在南京大屠杀记忆复兴的过程中浮现出了两个主导叙事，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和“落后就要挨打”，分别指向与南京大屠杀记忆相关联的国际和国内两个维度。^[10]在爱国主义教育运动中，南京大屠杀被当作中国近代史上标志性的“创伤”，与鸦片战争、圆明园、“九一八”等其他创伤一道，被纳入到了国耻叙事之中。于是，与创伤相关联的“受害者”叙事被用来作为激发青少年爱国情感和民族复兴热情的重要手段。^[11]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创伤记忆与复兴想象”构成了“雪耻型民族主义”这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气质形态”。^[12]

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并非孤立的叙事，它折射出“抗日战争”这一宏大叙事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与上述历史分期相呼应，詹姆斯·赖利（James Reilly）把当代中国对于抗战的官方历史和记忆也分为四个阶段：1982年之前中国对于日本战争暴行“善意的遗忘”；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的历史行动主义（战争索偿等）；2005年前后官方修辞对于日本和战争过去的软化/翻转。^[13]帕克斯·库伯（Parks Coble）也指出，在毛泽东时代，抗战的公共记忆聚焦于共产党的战绩，而战争中的冲突则彻底消失。在改革开放年代，随着官方对民族主义的强调，关于战争的新记忆一方面强调爱国主义的英勇抵抗，另一方面则强调日本的战争暴行，将中国从“胜利者”转变为“受害者”。^[14]

在徐晓宏和琳恩·斯皮尔曼（Lyn Spillman）看来，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沉浮轨迹或许是文化创伤理论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反面案例”。^[15]南京大屠杀的基本事实从一开始就广为人知；受害者和加害者的身份也不存在实质性的争议。然而，至少在1937-1979年这段时期，南京大屠杀却根本没有被当作一个重要的文化创伤。“为什么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再现既未能实现符号扩展，也未能令海内外的公众对之产生认同？”他们认为，除了现实政治经济、社会心理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之外，也有必要去检视集体记忆背后的文化力量和机制。南京大屠杀之所以从中国的集体记忆之中消失，与当时盛行的进步主义叙事和强调“人民之间友谊”的普遍化观念亦不无关系。只有在进步主义叙事式微之后，我们才能全面地体认他者之痛，而南

京大屠杀也才能在集体记忆中得以重新浮现。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则从集体身份认同的角度指出，在抗战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承携者群体建构出了“革命叙事”（从失败走向胜利）和敌我二分（先是国共对抗，后是阶级区分）的叙事模式，令南京大屠杀无法被容纳进去。^[16]

作为“反面案例”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恰恰契合了文化创伤理论的基本观点。^[17]研究者指出，当特定集体的成员感到自己遭遇到了某一可怕事件，该事件在群体意识和记忆中打上无法磨灭的烙印，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身份认同时，这就意味着文化创伤已然发生了。^[18]一般地讲，只有当事件对于一个集体原有的意义模式或者默认的道德观念造成强烈的冲击，它才有可能被转换为创伤。^[19]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是一个社会文化过程。当可怕事件发生之后，某些“承携者群体”（carrier group）——可能是精英，也可能是边缘群体——将事件向一般大众进行解释并提出某些诉求，从而让后者感到自身的意义结构受到了挑战和威胁。承携者群体提出这些诉求的目的在于，把创伤建构为一个新的大叙事（master narrative）。而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承携者群体必须在下列四个基本问题上提供富有说服力的答案：创痛的性质是什么？受害者是谁？创伤受害者与一般大众之间有何联系？谁应该对此负责？他还指出，事件的文化创伤化可以同时宗教、审美、法律、科学、大众传媒，以及官僚机构等各种制度场域之中展开。不同制度场域都会根据自身的属性来开展文化创伤化的工作，而不同场域之间有时候也会显现出某种等级的分层。新闻媒体正是本研究要观照的一个制度场域。大众传媒既能为文化创伤带来话语扩展的机会，反过来也必然会使其受制于各种新闻生产常规（例如，叙事的简略、道德中立、对官方信源的倚重，以及不同视角的平衡处理）。^[20]

文化创伤理论为我们审视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所关注的既非“本体论”（即特定的诉求是否与本体真实相对应），也非“道德论”（即诉求的道德合理性）。它强调创伤再现过程中的“认识论”问题，即“谁在何种情境下提出何种诉求，如何提出，有何后果？”^[21]本研究希望从文化创伤理论出发，追踪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在新闻媒体这一制度场域之中的基本面貌和演变轨迹。如果说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湮没无闻是文化创伤的一个反面案例，那么它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是如何被“重新发掘”并“呈现”出来的呢？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内容分析方法。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事件，关于它的文章在数量上自然不会太多，因此，目的性样本应该是一个最佳的方案。抽样过程包括检索和筛选等两个阶段。我们以“南京大屠杀”作为关键词，利用在线数据库“《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全文检索系统”先后对文章的标题和正文进行检索，得到了两个子样本。子样本I中落在1949-2012年间的文章169篇，子样本II中落

在该时段的文章 876 篇。随后，我们依次按照两个标准进行了筛选。标准一，文章必须主要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子样本 I 中的文章全部符合该标准，而子样本 II 中大约五分之四的文章都被剔除了，剩下 194 篇（22.1%）。标准二，排除所有不是报道或言论的文章。结果，子样本 I 和 II 分别被剔除了 4 篇和 18 篇。最终，得到了一个由 341 篇文章所组成的样本，即建国以来（1949-2012 年）《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样本。

本研究分析单位和观测单位均为“文章”。为了系统地揭示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基本面貌，我们在深入阅读这些文章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系列变量，主要包括：发表年份，发表日期，是否头版（1/0），是否头条（1/0），国内还是国际版（1 = 国内版，2 = 国际版），是否配图（1/0），图片类型（1 = 新闻照片，2 = 漫画，3 = 历史资料图片），文章体裁（1 = 报道，2 = 言论），文章主题（1 = 纪念事件，2 =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行及有关回应，3 = 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4 = 南京大屠杀的证据），是否提及南京大屠杀证据（1/0），是否提及正确认识历史（1/0），是否提及反战和平（1/0），是否提及国家间的关系（1/0），是否提及爱国主义（1/0），是否提及纪念语境（1/0），是否出现纪念地点（1/0），是否提及否认、歪曲或篡改等行为（1/0），是否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1/0），是否提及南京大屠杀的抵抗者（1/0），是否提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1/0），是否提及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1/0），是否出现“军国主义”标签（1/0），是否出现“法西斯”标签（1/0），是否出现“右翼”标签（1/0），是否出现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1/0），以及是否出现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1/0）。在这些变量中，大多数都是二分变量。

在正式进行编码之前，本文两位作者对于所有变量的操作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我们从样本中以系统抽样法选取了 40 篇文章，各自独立编码，进行信度检验。结果发现，文章体裁、文章主题和是否出现加害者、是否出现受害者，以及是否出现见证人等几个变量的信度系数偏低（ <0.85 ）。于是，我们对这几个变量的操作化再次详加讨论。正式的编码工作也是由研究者完成。为了确保编码的质量，两位作者各自独立地将整个样本编码了一遍，再逐个变量进行比照。对于少数不一致的地方，再次讨论之后进行赋值。

四、研究发现

（一）“重新发现”南京大屠杀

《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年份分布极不均衡（见图 1）。我们不妨将 1949-2012 年这 63 年划分为三个时期：建国后的十七年、“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在第一个时期，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文章凤毛麟角（3 篇），其中，1951 年 1 篇，1960 年 2 篇。尽管它们都将“南京大屠杀”作为话语资源，然而却并非缘于有意识的纪念目的，其目标指向甚至也不是日本，而是以“历史控诉”

作为工具，批判美帝国主义武装日本和与日本签订安保条约。在第二个时期，《人民日报》上没有出现一篇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纪念文章。甚至在抽样的检索环节，这一时期也未发现任何符合条件的文章。可见，这是南京大屠杀纪念话语在《人民日报》上彻底湮没无闻的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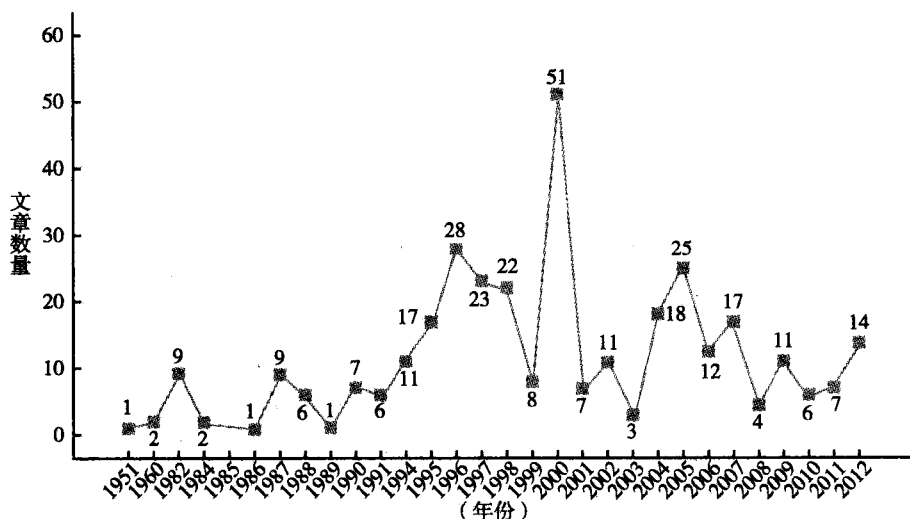


图1 《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数量的年度分布（1949-2012年）

1982年是南京大屠杀报道的转折点。这一年，以日本文部省修订历史教科书事件为契机，《人民日报》将“南京大屠杀”重新发掘出来，共发表了9篇文章。在1982-2012年期间，年均发文10.9篇。发文0篇的年份仅有3年（1983年、1992年和1993年）；发文10篇以上的年份有13个（41.9%）；发文20篇以上的有5个（16.1%）。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人民日报》上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迎来了第一个高峰（17篇）。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数量稳定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2000年，发文量达到顶峰（51篇）。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发文量又急剧跌落到了平均水平以下。在将新时期以来的文章数量按照年代进行分段之后发现，1980年代不足一成（8.9%），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分别占36.1%和47.1%，2010年代前三年不到一成（8.0%）。

在南京大屠杀被《人民日报》“重新发现”以来，每年的纪念文章数量处于一种起起落落的状态。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这种起伏呢？一方面，新闻媒体的纪念报道带有很强的周期性，它们通常把“整十”的纪念日看得更为重要。^[22]因此，特定年份是否处于“整十”这种关键的纪念时刻，可能会影响新闻媒体呈现一个历史事件的强度。另一方面，一个具有相关度的当代事件也能为新闻媒体创造出重返某一历史事件的“话语契机”。鉴于此，我们建构了三个变量——“南京大屠杀整十周

年”（是/否）、“抗日战争胜利整十周年”（是/否）和“当年中日之间摩擦事件数量”——来预测新时期以来《人民日报》纪念文章的数量变化。需要说明的是，第三个变量是以纪念文章中所提及的摩擦事件为依凭，而并不是指两国之间实际发生的摩擦事件的数量。此外，关键纪念时刻所发生的摩擦事件或许比其他时刻的同类事件有更大的机会进入新闻媒体，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会在下面的分析中考虑交互效应的基本理由。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见表1），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显著性（ $F = 6.153$, $p = 0.001$ ），它解释了《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数量接近一半的变差（48.8%）。在五个自变量中，只有南京大屠杀整十周年（ $p = 0.041$ ）和当年中日摩擦事件数量（ $p = 0.000$ ）具有统计显著性。比较起来，前者（ $\beta = 0.469$ ）对于回归模型的贡献比后者（ $\beta = 0.743$ ）小得多，这说明，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年度数量受当年中日摩擦事件的影响比受南京大屠杀的关键纪念时刻的影响要大得多。

表1 《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年度数量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 | 标准化的回归系数 | p 值 |
|--------------------------|----------|-------|
| 关键的纪念时刻 | | |
| 南京大屠杀整十周年 | 0.469 | 0.041 |
| 抗日战争胜利整十周年 | 0.178 | 0.313 |
| 具有相关度的当代事件 | | |
| 当年中日两国摩擦事件数量 | 0.743 | 0.000 |
| 交互变量 | | |
| 交互变量1（摩擦事件数量 * 大屠杀整十周年） | -0.330 | 0.139 |
| 交互变量2（摩擦事件数量 * 抗日战争整十周年） | 0.179 | 0.295 |

$F = 6.153$, $R^2 = 0.583$, Adjusted $R^2 = 0.488$, $p = 0.001$

版面处理是纪念报道呈现方式的一个重要侧面。通过将版面区分为国际版面和国内版面，我们想知道，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被建构为“国内问题”抑或“国际问题”？此外，它们有多大的机会登上头版头条或者其他版面的头条？统计结果显示，首先，六成文章（59.8%）刊发在国内版面，四成（40.2%）在国际版面，说明南京大屠杀纪念报道牵涉到了较多的“国际”元素。其次，有9篇（2.6%）文章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但没有一篇是头版头条。在9篇头版文章中，有5篇是关于中国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4篇）或者日本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1篇）批驳日本右翼的否定言行的。第三，它们登上其他版面头条的机会也非常渺茫（7.2%）。这说明，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在《人民日报》的话语空间中并未占据显著的位置。

集体记忆不是一种抽象的存在，它往往发生于特定的社会框架之下，^[23]与特定

的记忆场所联系在一起。^[24]纪念语境和记忆场所分别指向集体记忆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统计结果显示，35.5%（121篇）的文章明确地提及了纪念语境，个别文章甚至提及了不止一个纪念语境。在被提及的全部129个纪念语境中，有一半（51.9%）都是南京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与抗日战争有关的周年纪念日（包括抗战胜利周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周年、卢沟桥事变周年和九一八事变周年）也占了较大的比重（37.2%）。这清楚地表明，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是在“抗战”这一大叙事之中展开的。其实，在“抗战”大叙事的框架之下，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件、南京大屠杀等发生在不同时空的事件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彼此勾连在一起，从而一个事件的纪念语境也就能轻而易举地“溢出”到其他事件。其他被提及的纪念语境有中日邦交正常化周年（1.6%）、清明节（1.6%）、中丹建交周年（1.6%）、国际大屠杀周年（0.8%），以及中国共产党建党周年（0.8%）等。

再来看记忆场所。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南京大屠杀都没有一个制度化的、有形的记忆场所，这恐怕也是造成它后来所面临的集体记忆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1985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简称“南京大屠杀纪念馆”）落成并于1997年被列入首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名单，同时修建/发掘的还有一系列分散于南京市各处的纪念场所，诸如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纪念碑、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东郊丛葬地纪念碑等。南京大屠杀自此终于有了一批制度化的记忆场所，它们也理所当然地变成了承载各种纪念活动的新闻现场。研究显示，四成文章（39.9%）明确地提及了记忆场所。在被提及的全部155处场所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占据绝对优势（72.9%），南京市其他纪念场所则高度边缘化（9.0%），而拉贝故居等与历史见证人紧密相关的遗迹更是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1.9%）。在文本写作策略上，那些被边缘化的记忆场所往往出现在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作为报道主体的末段，充当一个扩展性的注脚。例如，“同一天，南京市民还分别在燕子矶纪念碑、中山码头纪念碑等处举行了悼念活动”^[25]。值得注意的是，与纪念语境的情形相似，其他抗战记忆场所对于南京大屠杀也表现出了某种溢出效应。统计结果显示，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沈阳九一八事变陈列馆等记忆场所加在一起也占了一成多（12.9%）。这种溢出效应不仅再次清楚地表明了南京大屠杀纪念与“抗战”大叙事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更进一步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揉入了“近代史”（中国革命博物馆）乃至“华夏文明史”（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叙事框架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记忆场所唤发的溢出效应比纪念语境更加强大。

（二）纪念主题与内涵

《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呈现贯穿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条关注过去，通过对纪念事件的报道和对历史事件的再挖掘来将之重构为文化创伤；另外一条则关注当下，焦点是“如何对待历史”——是否定篡改还是反思忏悔。我们把全部341篇

文章归入四个主题之下，结果发现，落入“纪念事件”主题下的文章最多（43.1%），其次是“否定言行及其回应”（27.0%），而“日本各界反思和忏悔”和“南京大屠杀证据”分别占17.6%和12.3%。

虽然“纪念事件”主题比重最大，但是此类文章往往都是常规化和仪式化的，特别是在大屠杀纪念日前后刊发的例行报道，通常篇幅短小，文本单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否定言行及其回应”为主题的文章则具有更强的新闻性和戏剧性，经常是连续报道，文本也往往更富张力。例如：

新年伊始，日本右翼势力又在为军国主义招魂：一伙右翼分子23日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上演了一场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反华闹剧。他们打着“彻底验证南京大屠杀”的旗号，公然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20世纪最大的谎言”，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全体中国人民不能不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26]

文中言及的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右翼集会是当年的中日摩擦事件之一。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人民日报》共刊发相关报道23篇，本报评论员文章2篇，几乎占到当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发文量（51篇）的一半。这些文章生动地展现了《人民日报》如何将大屠杀记忆的当代困境——日本右翼的否定言行——建构为第二个层次的文化创伤，或用张纯如的话来讲，“第二次大屠杀”。^[27]加害者是“日本右翼势力”，而受害者并不限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而是直接扩展到“全体中国人民”，还涵盖了“遭受战争惨祸”的“亚洲各国和人民”^[28]，甚至也“包括广大日本人民在内的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29]。

前述引文中出现了两个标签：“右翼”和“军国主义”。从字面上讲，军国主义指向过去战争时期日本之恶，而右翼则指向日本当下否定战争之恶，它们分别与过去和当下的创伤相关联。这里，“为军国主义招魂”这一表述把过去和现在勾连在了一起，其批判对象仍然指向右翼。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这两个标签分别出现在28.2%（96篇）和26.7%（91篇）的文章中。卡方检验显示，右翼标签（ $\chi^2 = 38.07$, $p = .000$ ）和军国主义标签（ $\chi^2 = 42.14$, $p = .001$ ）在四个文章主题下的分布均存在显著的差异。右翼标签在以“否定言行及其回应”为主题的文章中出现比例最高（48.9%），而在“纪念事件”主题下的比例最低（13.6%）。军国主义标签也同样是在“否定言行及其回应”主题下的出现比例最高（52.2%），在“纪念事件”主题下的比例最低（16.3%）。可见，《人民日报》仰赖这两个标签来建构冲突语境，而“当下之恶”显然比“过去之恶”更为重要。

第三个主题“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部分地是由日本右翼势力的否定篡改言行所触发。反思和忏悔的主体既包括具体的个体（如东史郎等侵华日军老兵），也包括社会团体（如“绿色赎罪”植树访华团），甚至还包括了泛化的“日本人民”，他们对于右翼的言行作出一种批判性的表态。与仪式化的“纪念事件”不同，这一主

题与“否定言行及其回应”之间相互呼应，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它落实并强化了“日本右翼”与“日本人民”之间的区分。^[30]而这种区分，实际上也正是《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惯常用的话语策略。例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告诉记者：‘我只恨那些侵略者，恨那些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但是这些人只是一小撮，多数日本人民是友好的’”^[31]。另一方面，它也为大屠杀的记忆困境——由否定和背叛所造成的“文化创伤”——提供了解决的“参照”，即右翼像其他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一样进行反思和忏悔。

表2 右翼和军国主义标签与文章主题的交互表

| | | 文章主题 | | | | 合计 |
|------|-----|-------------|------------|------------|------------|-------------|
| | | 纪念事件 | 否定言行及其回应 | 日本各界反思和忏悔 | 南京大屠杀证据 | |
| 右翼 | 未出现 | 86.4 (127) | 51.1 (47) | 63.3 (38) | 78.6 (33) | 71.8 (245) |
| | 出现 | 13.6 (20) | 48.9 (45) | 36.7 (22) | 21.4 (9) | 28.2 (96)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 军国主义 | 未出现 | 83.7 (123) | 47.8 (44) | 80.0 (48) | 83.3 (35) | 73.3 (250) |
| | 出现 | 16.3 (24) | 52.2 (48) | 20.0 (12) | 16.7 (7) | 26.7 (91)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右翼 * 文章主题: $\chi^2 = 38.07$, $df = 3$, $p = .000$

军国主义 * 文章主题: $\chi^2 = 42.14$, $df = 3$, $p = .001$

最后一个主题是“南京大屠杀证据”，占到一成多（12.3%）。其实，多达六成的文章都或多或少提及了南京大屠杀证据的问题（60.1%，205篇）。之所以“为历史作证”成为紧迫的要求，是因为在现实的社会政治中有人在试图“否定历史”。因此，这一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应南京大屠杀记忆的当代困境而生。那么，究竟是哪些行动主体在“为历史作证”呢？统计结果显示，在以“南京大屠杀证据”为主题的文章中，出现比例最高的行动主体是“见证人”（57.1%），其次是加害者（45.2%），而受害者则很少出现（14.3%）。我们在细读文本之后发现，大体上，《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中证据的重要性等级为：档案文件最高，侵华日军的记录和外国目击者的证词次之，受害者证词则最低。

此外，对于1980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代的文章主题的卡方分析显示，不同年代的主题分布存在显著差异（ $p = 0.024$ ）。从表3中可以看到几点变化：第一，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越来越呈现出“纪念化”的主题趋势。“纪念事件”主题的比重从1980年代的33.3%稳步上升到了2000年代的47.8%，到2010年代更是高达63.0%。换言之，针对南京大屠杀的有意识的、仪式化的纪念报道越来越多。第二，与“纪念事件”刚好相反，“否定言行及其回应”主题则一路走低，从1980

年代的 36.7% 降至 2000 年代的 25.2%，再跌至 2010 年代的 14.8%。第三，“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是四个主题中最为稳定的，波动幅度始终没有超过 5 个百分点。第四，“南京大屠杀证据”主题在 1990 年代所占比重最大（20.5%）；在其他三个时期，其比重在四个主题中均处于垫底的位置，到了 2010 年代，它几近消失（3.7%）。

表 3 不同年代的文章主题分布状况

| | 1980 年代 | 1990 年代 | 2000 年代 | 2010 年代 | 合计 |
|---------|------------|-------------|------------|------------|-------------|
| 纪念事件 | 33.3 (10) | 36.1 (44) | 47.8 (76) | 63.0 (17) | 43.5 (147) |
| 否定言行及回应 | 36.7 (11) | 27.9 (34) | 25.2 (40) | 14.8 (4) | 26.3 (89) |
| 日本反思与忏悔 | 20.0 (6) | 15.6 (19) | 18.9 (30) | 18.5 (5) | 17.8 (60) |
| 南京大屠杀证据 | 10.0 (3) | 20.5 (25) | 8.2 (13) | 3.7 (1) | 12.4 (42) |
| 合 计 | 100.0 (30) | 100.0 (122) | 100.0 (59) | 100.0 (27) | 100.0 (338) |

$$\chi^2 = 19.09, df = 9, p = 0.024$$

除了主题之外，我们也关注《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呈现凝聚成了怎样的纪念内涵，这牵涉到“为何纪念”和“纪念成什么”等问题。与主题不同，纪念内涵与南京大屠杀直接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既可以是一种系统的表达，也可以是只言片语。在对大屠杀纪念事件的常规报道中，我们不时读到这样的陈述：

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悼念遇难同胞，就是为了警策世人，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就是为了揭露和批判日本一小撮右翼分子否定侵略、妄图翻案、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就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不忘国耻，深刻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32]

这是一篇于南京大屠杀纪念日（12 月 13 日）次日刊登的典型的常规纪念报道。而这几句仪式化甚至口号化的表述隐含着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在三个“就是为了……”的语句中，南京大屠杀首先被描绘为不能重演的“历史悲剧”，继而是被“一小撮右翼分子”妄图翻案的“侵略（史实）”，最后落脚到不能忘记的“国耻”和“历史教训”。为了系统地揭示出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的纪念内涵，我们提炼出一组与南京大屠杀相关联的关键词——包括“以史为鉴”、“反战和平”、“国家间友谊”，以及“爱国主义”，并统计了其出现频率。结果发现，有一半（51.6%）的文章提及否认、歪曲或篡改历史的言行；56% 的文章提及要正确地认识历史。这再一次表明，“如何对待历史”是南京大屠杀记忆面临的最大困境。

另外，有 13.2% 的文章提及了爱国/爱国主义及其相关表述（例如，“振兴中华”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有关爱国主义的表述中的四分之三（75.6%）都出现在以“纪念事件”为主题的文章中，偶尔也出现在“否定言行及其回应”（11.1%）和“南京大屠杀证据”（13.3%）两个主题下。不过，在 1990 年代中期以后，将南京大屠杀建构为“国耻”，并纳入到爱国主义叙事之中，的确成

为了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如果抛开抽样时的第一条筛选标准，我们会发现更多此类的符号化运作。例如：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招牌和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是将中国人踩在脚下、踩入地下的铁证。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下，满身疮痍的中国人是无力站起，无权站直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华民族才重新昂起头来，获得了新生。^[33]

这篇文章的主旨与南京大屠杀无关，甚至与抗战也无关。通过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代表屈辱的标语并置，南京大屠杀被建构为近代史上的“国耻”之一；不过，这种并置却也严重地削弱了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和暴行的严重程度。而由这一国耻所引发的“历史教训”是一个更为经典的表述，即“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表述似乎暗示着屠杀的某种“必然性”，但问题是，落后是否就一定要遭受“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是可理解的“战争暴行”，还是“不可理解的人类罪恶”？更重要的是，“落后就要挨打”并不是专门针对南京大屠杀发展出来的论述。经由它，南京大屠杀与整个以“屈辱-复兴”为核心的官方近代史叙事勾连和对接起来，变成了后者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三）承携者群体

根据文化创伤理论，承携者群体在一个事件转换为文化创伤的过程中至关重要。他们不但充当着一起可怖事件的解释者，而且也是诉求的伸张者。作为创伤建构的制度化场域，新闻媒体必须倚仗特定的言语行动者（国家、群体、个人）来建立文化创伤的诉求。为了更好地展现南京大屠杀承携者群体的基本面貌，我们作了如下两种区分：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下，考察国家（操作性地定义为“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和市民社会（操作性地定义为“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如何充当承携者的角色及其话语实践；另一方面，我们着力关注四类行动者——“加害者”、“受害者”、“抵抗者”和“见证人”——在新闻媒体建构创伤叙事和勾勒集体记忆轮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如何再现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和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又如何再现加害者、抵抗者、受害者与见证人？这些行动者参与到怎样的话语实践当中？

统计结果显示（见表4），将近一半（48.4%）的文章明确提及了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其中，既有中央政府及其代言人，也有地方政府及其代言人。可见，国家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对文章主题和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进行交互分析发现（见表4），接近八成（79.3%）以“否定言行及其回应”为主题的文章中都出现了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这说明《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中所再现的话语冲突主要发生在中、日两国政府层面上。而以“南京大屠杀证据”为主题的文章中则很少出现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21.4%）。卡方检验显示，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在四个主题上的分布差异显著（ $p=0.000$ ）。

略强于三分之一的文章明确提及了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35.8%），但其中只有一次被放在了头版，且是与由政府机构打头的一系列行动者并置在一起。对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和文章主题进行交互分析发现（见表4），接近六成（58.3%）以“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为主题的文章中出现了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而他们出现在以“纪念事件”为主题的文章中的比例不到三成（27.9%）。可见，在日本，主要是社会团体在表达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反思和忏悔。卡方检验显示，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在四个主题上的分布存在着显著差异（ $p=0.001$ ）。

表4 不同主题的文章提及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和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的状况

| | | 文章主题 | | | | 合计 |
|-----------|-----|-------------|------------|------------|------------|-------------|
| | | 纪念事件 | 否定言行及其回应 | 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 | 南京大屠杀证据 | |
| 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 | 未出现 | 63.9 (94) | 20.7 (19) | 50.0 (30) | 78.6 (33) | 51.6 (176) |
| | 出现 | 36.1 (53) | 79.3 (73) | 50.0 (30) | 21.4 (9) | 48.4 (165)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 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 | 未出现 | 72.1 (106) | 65.2 (60) | 41.7 (25) | 66.7 (28) | 64.2 (219) |
| | 出现 | 27.9 (41) | 34.8 (32) | 58.3 (35) | 33.3 (14) | 35.8 (122)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政府及其代言人 * 文章主题： $\chi^2=56.55$ ， $df=3$ ， $p=0.000$

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 * 文章主题： $\chi^2=17.41$ ， $df=3$ ， $p=0.001$

为了揭示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和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在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中的出场或缺席状况，我们也对他们进行了交互分析。在全部341篇文章中，这两类行动者只在五分之一（19.9%）的文章中同时出场，而在超过三分之一（35.8%）的文章中同时缺席。在有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出场的文章中，有四成（41.2%）出现了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而在没有前者出场的文章中，有三成（30.7%）出现了后者。在有社会团体及其代言人出场的文章中，55.7%的文章也出现了政府机构及其代言人。卡方检验显示，这两类行动者在出场和缺席的分布上存在着显著差异（ $p=0.043$ ）。

下面，再来看纪念文章中的加害者、抵抗者、受害者和见证人的情况。抵抗者几乎处于一种缺席状态。仅有5篇（1.5%）文章明确提到了三名抵抗者，即南京卫戍军司令唐生智、南京保卫战司令肖山令和国民党军旅长陈颐鼎。以提及唐的文章最多（4篇）。只有2篇文章分别把抵抗者陈颐鼎和肖山令作为了报道的主角。^[34]抵抗者的缺席使得人们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将士们知之甚少。甚至连最基本的史实也互有抵牾。例如，一篇文章称唐生智率守军“5万”，^[35]另一篇则说“约14万”。^[36]在这些抵抗者中，只有陈颐鼎这位幸存的将士扮演“承携者”角色，他“用亲身经历谴责日本文部省的错误”。

分别有 25.2% 和 17.3% 的文章明确提及了加害者和受害者。值得注意的是，加害者和受害者宛如两股道上的车，极少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中（3.8%）。此外，五分之一（20.2%）的文章提及了见证人。把这三类行动者分别与文章主题进行交互分析发现（见表 5）：第一，加害者出现在以“南京大屠杀证据”为主题的文章中的比例最高（45.2%），而出现在“纪念事件”主题下的比例最低（8.2%）。第二，受害者在四个主题下的出现比例都很低（<20%），且彼此之间差距也很小。第三，见证人出现在以“南京大屠杀证据”为主题的文章中的比例最高（57.1%），而出现在“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主题下的比例最低（3.3%）。卡方检验显示，受害者在四个主题下的分布无显著差异（ $p=0.841$ ），而加害者（ $p=0.000$ ）和见证人（ $p=0.000$ ）在各主题下的分布均有显著差异。

表 5 不同主题的文章提及加害者、受害者和见证人的状况

| | | 文章主题 | | | | 合计 |
|-----|-----|-------------|--------------|----------------|-------------|-------------|
| | | 纪念事件 | 否定言行 及其回应 | 日本各界的 反思和忏悔 | 南京大屠杀 证据 | |
| 加害者 | 未出现 | 91.8 (135) | 64.1 (59) | 63.3 (38) | 54.8 (23) | 74.8 (255) |
| | 出现 | 8.2 (12) | 35.9 (33) | 36.7 (22) | 45.2 (19) | 25.2 (86)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 受害者 | 未出现 | 82.3 (121) | 80.4 (74) | 85.0 (51) | 85.7 (36) | 82.7 (282) |
| | 出现 | 17.7 (26) | 19.6 (18) | 15.0 (9) | 14.3 (6) | 17.3 (59)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 见证人 | 未出现 | 78.9 (116) | 87.0 (80) | 96.7 (58) | 42.9 (18) | 79.8 (272) |
| | 出现 | 21.1 (31) | 13.0 (12) | 3.3 (2) | 57.1 (24) | 20.2 (69) |
| | 合计 | 100.0 (147) | 100.0 (92) | 100.0 (60) | 100.0 (42) | 100.0 (341) |

加害者 * 文章主题： $\chi^2=41.30$ ， $df=3$ ， $p=0.000$

受害者 * 文章主题： $\chi^2=0.83$ ， $df=3$ ， $p=0.841$

见证人 * 文章主题： $\chi^2=49.08$ ， $df=3$ ， $p=0.000$

由于多数见证人已经作古，因此他们在纪念报道中并非充当承携者，而是更多地扮演“为历史作证”的角色。相较之下，加害者最为复杂。它并非一个统一的诠释社群，而是高度分裂的。作为南京大屠杀的作恶者，少数日本老兵在时过境迁之后开始反思和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大多数人缄默不语，而另一些人则不但极力否认罪行，还诋毁和打压那些忏悔者。其中，东史郎是出现频率最高的由加害者转变而来的承携者群体的集中代表。《人民日报》对于他的出书、活动和诉讼等等都进行了大量报道，并将其建构为与右翼不懈斗争的“反战人士”^[37]和“和平战士”^[38]。有时候（例如在东史郎败诉时），来自中国的承携者群体也会通过谴责日本司法当局或右翼势力等言语行动，来与东史郎形成一种道义上的联合或者结盟。在日本国内，

站在承携者群体对立面的不但有极力否认的老兵，更有与其合谋并不时挑起事端的右翼权力精英。因此，加害者往往卷入到强烈的言语行动之中，最模式化的言语行动模板是，×××“愤怒谴责”、“强烈抗议”、“严词批驳”或“坚决支持”等。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将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和“受害者”作了严格的区分，受害者和幸存者含义相同。在《人民日报》南京大屠杀纪念文章中，受害者是一个基本的承携者群体，他们偶尔会利用亲身经历来提出个体化的诉求；不过，在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却是以“中国人”这一集体身份来伸张诉求的。我们注意到，纪念文章显然未能充分运用受害者这一承携者群体。就量而言，记者们仅仅把极少数受害者作为了消息来源，尤其是习惯性地依靠夏淑琴和李秀英等人来伸张诉求。就质而言，在很多时候，幸存者的出场和发声不过是“仪式化”的乃至“工具化”的。例如，幸存者代表出现在纪念仪式现场；与到访的日本领导人座谈或展示“身体上的伤疤”，作为控诉者/声讨者抨击日本右翼的言行；让他们对于某些新近的社会政治事件进行表态。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运用定量的内容分析方法，辅之以定性的文本分析，从文化创伤和集体记忆的理论出发，分析了建国以来（1949-2012年）《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呈现。我们发现，自1982年南京大屠杀被“重新发掘”以来，纪念报道的重心就被放在当下。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纪念报道的文章数量更多地是随着中日之间摩擦事件的数量而起伏，一桩右翼集会可能引发连篇累牍的报道。第二，在主题分布上，尽管“纪念事件”比例最大，然而“右翼的否定及其回应”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文本，由此《人民日报》得以将右翼篡改历史的行径建构为当代的文化创伤。在建构创伤诉求的时候，国家尤为重要，而受害者和加害者——特别是东史郎等与右翼作斗争的老兵——也有可能充当承携者。此外，“日本各界的反思和忏悔”和“南京大屠杀证据”这两个主题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大屠杀记忆的当代困境相呼应。第三，在标签的运用上，指向过去的“军国主义”也更多用来批判当下的“右翼”行径，显示出“当下之恶”的话语优先性。

随着岁月的流逝，《人民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呈现显示出一种“纪念化”的趋势，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叙事重心在未来或许会发生转移。但问题是，这套南京大屠杀叙事可能仍然欠缺最为核心的部分，即对“受害者”的呈现，尤其是受害者的自主言说。在我们所分析的几类主要行动主体中，受害者的出现频率低于加害者和见证人。在“为历史作证”方面，见证人和加害者的“地位”远比受害者来得重要。而在“批驳右翼言行”这一目标之下，加害者所扮演的承携者角色更为积极，形象更为立体，而受害者则主要是以“中国人民”的代言人身份在表达“集体性”（口号式）的诉求。在“纪念事件”中，受害者也更多地是仪式化地出场。概

而言之，在聚焦当下的诉求目标之下，受害者的叙事及其主体性都遭到了压抑和削弱。对于一起几十年前的“历史事件”，没有受害者叙事作为内核的创伤叙事恐怕很难焕发出强大的符号力量，难以将情感和身份认同扩展到更广阔的受众。

在文化创伤的建构过程中，南京大屠杀更多地与抗战乃至更广阔的近代史叙事勾连在一起。首先，抗战框架构筑了《人民日报》纪念南京大屠杀的时间和空间维度。在纪念语境方面，除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之外，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等抗战中的其他重要时间节点也提供了纪念契机。在记忆场所方面，尽管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成为最便利、等级最高的制度化场所，但纪念报道也自然而然地“溢出”到了其他抗战记忆场所乃至国家记忆场所，从而将南京大屠杀建构成了抗战叙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近代史及其相关的叙事框架还深深地影响着大屠杀的纪念内涵。作为历史惨剧和过去的创伤，大屠杀被建构为“国耻”，并与其他或近（如七七事变）或远（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国耻”并置在一起，落实在“落后就要挨打”这一高度功利性和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教训上。这种建构思路，一方面借重了近代史主导叙事的话语资源，但另一方面则弱化了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局限了历史创伤的意义空间。相应地，在创伤的“解决”方面，当下的创伤需要日本政府的道歉和反思来抚平，而历史的创伤则要通过“民族复兴”来“一雪前耻”。然而，无论是哪一个解决之道都无法跳脱外交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藩篱，因此无法针对南京大屠杀发展出特定的叙事，也未能为替代性的叙事方式（例如，“人性之恶”或“救赎”）留下空间。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为了忘却的纪念：南京大屠杀集体记忆的建构与传播”（项目编号：11YJC860023）的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博士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博士

注释

- [1] Chang, I.,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 [2] Coble, P. M., The legacy of China's wartime reporting, 1937 - 1945: Can the past serve the present? *Modern China*, 36 (4), 2010, pp. 435 - 460. Coble, P. M., Writing about Atrocity: Wartime Accounts and their Contemporary Uses,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2), 2010, pp. 379 - 398. 经盛鸿：《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出版社，2010年。
- [3] 经盛鸿：《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
- [4] 经盛鸿：《〈世界展望〉最早使用“南京大屠杀”一词》，《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25日，第B01版。
- [5] 详见以下文献：Alexander, J. C., Eyerman R., Giesen B., Smelser, N. J. & Sztopka P.,

-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Berry, M. S. , *A History of Pain: Literary and Cinematic Mappings of Violence in Modern Chin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2004.
- Coble, P. M. ,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 – 1945,” *China Quarterly*, 190, 2007, pp.394 – 410.
- Fogel, J. A. (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Fujitani, T. , White, G. M. & Yoneyama, L. (Eds.),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 (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Li, F. , Sabella, R. & Liu, D. (Eds.), *Nanking 1937: Memory and Heal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 Reilly, J. , “Remember history, not hatred: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2), 2011, pp.463 – 490.
- Seo, J. , “Politics of memory in Korea and China: Remembering the Comfort Women and the Nanjing Massacre,” *New Political Science*, 30 (3), 2008, pp.369 – 392.
- Yang, D. , The malleable and the contes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postwar China and Japan, in F. T. Geoffrey, M. White & L. Yoneyama (Eds.), *Perilous Memories: The Asia-Pacific War (s)* (pp.50 – 86),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Yoshida, T. ,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第5-22页。
- [6] Yoshida, T. ,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7] 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第14页。
- [8] 刘燕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1937-1985）》，《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4期，第5-22页。
- Reilly, J. , “Remember history, not hatred: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2), 2011, pp.463 – 490.
- [9] Yoshida, T. , *The Making of the “Rape of Nanking”: History and Memory in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eilly, J. , “Remember history, not hatred: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2), pp.463 – 490, 2011.
- [10] Chi, Y. S. , *Picture Perfect: Narrating Public Mem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unpublishe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01.
- [11] Wang, Z. , *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 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2] 刘擎：《创伤记忆与雪耻型民族主义》，《书城》2004年第12期，第47页。
- [13] Reilly, J. , “Remember history, not hatred: Collective remembrance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to Japan,” *Modern Asian Studies*, 45 (2), 2010, pp.463 – 490.
- [14] Coble, P. M. , “China’s ‘new remembering’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of Resistance, 1937 – 1945,” *China Quarterly*, 190, 2007, pp.394 – 410.

- [15] Xu, X., & Spillman L., Political centres, progressive narratives and cultural trauma: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njing Massacre in China, 1937 – 1979, in M. Kim and B. Schwartz (Eds.), *Northeast Asia's Difficult Past: Essays in Collective Memory* (pp. 101 – 128), New York, NY: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16]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 [17] Alexander, J. C., Eyerman R., Giesen B., Smelser, N. J., & Sztompka P.,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Eyerman, R., *Cultural Trauma: Slavery and the Formation of African-American Ident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8]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6, 2012.
- [19]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5, 2012. Zelizer, B., “Finding aids to the past: bearing personal witness to traumatic public event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4 (5), 2002, p. 698.
- [20]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15 – 26, 2012.
- [21]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 14, 2012.
- [22] Forrest, T. R., “Disaster anniversary, A social reconstruction of time,” *Sociological Inquiry*, 63 (4), 1993, pp. 444 – 456.
- [23] Halbwachs, M., *On collective memor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24] Nora, P., “Between memory and history: Les lieux de mémoire,” *Representations*, (26), 1989, pp. 7 – 24.
- [25] 《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 71 周年》，《人民日报》2008 年 12 月 14 日，第 4 版。
- [26] 《是谁在制造谎言》，《人民日报》2000 年 1 月 24 日，第 4 版。
- [27] Chang, I., *The Rape of Nanking: The Forgotten Holocaust of World War II*,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7.
- [28] 《南京举行国际和平集会纪念抗战胜利 67 周年》，《人民日报》2012 年 8 月 16 日，第 3 版。
- [29] 《当代青年人勿忘过去》，《人民日报》1996 年 12 月 31 日，第 6 版。
- [30] Alexander, J. C., *Trauma: A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 [31] 《3300 件文物诉说沉痛记忆》，《人民日报》2007 年 12 月 14 日，第 5 版。
- [32] 《南京举行国际和平集会》，《人民日报》2004 年 12 月 14 日，第 8 版。
- [33] 《站起来的感觉》，《人民日报》1999 年 9 月 13 日，第 4 版。
- [34]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人民日报》1982 年 8 月 8 日，第 4 版。
《血染南京名垂青史》，《人民日报》1988 年 1 月 21 日，第 5 版。
- [35] 《历史岂能篡改》，《人民日报》1982 年 8 月 13 日，第 5 版。
- [36] 《石原公然虚构历史》，《人民日报》1999 年 4 月 27 日，第 6 版。
- [37] 《二战老兵东史郎逝世》，《人民日报》2006 年 1 月 14 日，第 3 版。
- [38] 《东史郎的愿与忧》，《人民日报》2000 年 3 月 4 日，第 2 版。

5 Yellow Emperor and Confucius: Two Symbolic Frameworks of Newspapers in late Qing dynasty

• *Jiang Hong*

The Yellow Emperor and Confuciu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of Chinese national symbol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revolutionary newspapers successfully “invented” the symbol of the Yellow Emperor as the nation’s ancestor. However, the royalist newspapers “reconstituted” Confucius as the leader of a Chinese religion. The Yellow Emperor and Confucius became dazzling elements of two great nationalist narrative frameworks of “conservation of our n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our religion”. As a modern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 press not only “re-imagined” the story of the Yellow Emperor and Confucius in the new “cultural psychology”, but also provided a field for the two stories to compete. Behind the competition of symbols, it was a collision between two press words systems of ethnic 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nationalism.

21 The Pre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China

• *Liu Hailong*

The remembered history tells us that communication study in mainland China was started in 1978. But this narration ignored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sociologists and journalism researchers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t that time, the English word “communication” was translated as “jiaotong(transportation)” in Chinese rather than today’s “chuanbo (communication)”, the latter only meaning “diffusion” then. Dewey and then Park’s visiting made Chicago School’s communication study known by Chinese scholars in 1920’s and 1930’s. By personnel exchange and translation, Cooley’s, Lippmann’s and Lasswell’s communication theory were familiar to Chinese. Moreover, Pen Wen Baldwin Sun, Gao Juefu, Liang Shichun and Ji Da even did their own communication stud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also attempts to provide possible answers to questions such as why these early academic traditions were interrupted and why today’s Chinese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collectively forget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communication study mentioned here.

37 Remembering and Traumatizing the Nanjing Massacre: A Content Analysis of People’s Daily’s Commemorative Coverage, 1949 - 2012

• *Li Hongtao, Huang Shunming*

Drawing upon the cultural trauma theory and literature on collective memor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People’s Daily has in the past six decades commemorated the Nanjing Massacre and represented

relevant contemporary controversies. We conducted a comprehensive content analysis of 341 news reports and commentar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st salient themes of the coverage are “commemorative events” and “Japanese denial and relevant response.” These two narrative threads traumatized both the massacre itself and its contemporary mnemonic dilemma. Within the master narrative of national humiliation, People’s Daily primarily relied on perpetrators and foreign witnesses to bear testimony to the past and construct collective memories. This has in turn marginalized victims/survivors by assuming them ritualistic positions.

55 A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Journalistic Collective Memory: History Told by Journalism and on Journalism

• *Zhang Zhian, Gan Chen*

This article is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n the Chinese Journalistic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Sun Zhigang event that happened ten years ago. We found that the Sun event was constructed by Chinese journalism both as a “general” historical event and a “hot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Moreover, there existed explicit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variousness on the memory construction of this event in Chinese journalism. We found that it does not matter if it is between the narrative of “general” history or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or between official media and market media, or between mass media and focus media, or between first media and other media, or between media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journalists, there existed different memory motivations and narrative strategies, which finally led to different collective memories on the same event.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because of the diversity of media system, orientation and value, Chinese journalism lacks a shared collective memory, and Chinese journalism has been far from a united, strong and intimat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78 Media and Class: A Classic Tradition of Communication Study

• *He Jing*

Chinese society has experienced a fundamental change. On the one hand, new social classes are taking shape, while on the other soc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equality are becoming more serious. Mass media have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is historical change and resonates with it. However, this important social phenomenon received little theoretic respons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sit a classic venu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mely, media and class research and summarizes its four major perspectives. Together with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ss media and social class change since the open and reform age,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use the ‘media and class’ research tradition to interpret the Chinese reality. It justifies that the class analysis should be introduced to communication studies to find the mass media’s role in the structural change of social class in China.